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传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史学会2023年年会综述

李晓英 唐 晔

为了加强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交流,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中国经济史学会、合肥学院、安徽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传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史学会2023年年会于2023年8月6—7日在安徽合肥顺利举行,来自海内外的数百名专家学者及10余家期刊、出版社、媒体单位与会。会议开幕式由合肥学院院长吴春梅主持,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魏明孔,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合肥市社科联主席曹加山,安徽大学副校长高清维分别致辞。

《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魏众主持开幕式主旨报告。在主旨发言中,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赵凌云指出,当代中国经济史学要为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提供历史依据,要为全面推进中国学术体系、科学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创新做出贡献。中国经济史学会顾问、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韩毅认为,国际经济史学的发展经历了经济理论和经济史“合一分一合”阶段,目前正快速走向融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探究了新四军的供给问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张连红,分析了大数据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现状。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亨得里克·拉克勒提出,建立一个富有成效的“国民经济生态系统”的核心先决条件是以智慧的方式使经济与高等教育接轨并融合。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王玉茹强调,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经济学理论都源于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系统挖掘和梳理,经济史要发挥史为今用的作用,多一些现实关怀。

在分组会议中分别展开了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与企业发展,财政与社会治理,货币金融与市场,商业、商人与经济思想等主题的深入研讨。

一、区域经济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相关问题研究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熊金武《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基础——基于传统经济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考察》提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核心理念。魏明孔《中国经济史的源流与展望》详述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历程,并指出区域经济史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史学界取得重要成就的领域。杨德才《论中国式现代化三次重大转型及其规律性特征》分析了1949年以来中国现代化的三次转型,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诸多具有普适性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创造出来的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道路。任志江《从早期现代化意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思想变迁研究》论述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变迁,提出应尽早将“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发展升华为“中国式现代化新理论”。

区域协调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张林峰《清中叶泽潞地区乡村经济结构研究——以服务业类型村落为个案》提出在村落经济非农化转型中,服务行业也是其

【作者简介】 李晓英,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特聘研究员,兰州,730070。唐晔,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保定,071000。

发展的重要渠道。刘岩岩《央地合作与东西协同:全面抗战时期西南民族地区工业互动发展的尝试》指出围绕工业发展,中央和地方的战时良性互动、西南民族地区和东部企业及人员的协同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侯培和《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甘肃摊派与农民负担述论》提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甘肃省各种额外摊派,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担负能力。马烈、李军《近代中国南北方农业经营风险差异探析》对比分析了近代南北方出现影响农业生产的灾害县次、爆发重大灾害的次数与死亡人数,证明了近代北方的自然灾害强于南方。吴静弦、魏众《从农业县到工业城市:改革开放初期沙洲地区经济重心的转变》考察了改革开放时期沙洲地区从农业县到工业地区的转变过程。

三线建设是 20 世纪 60—70 年代中国以加强国防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姜长青《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具体思路研究》,李科《毛泽东三线建设思想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经验启示》,王毅《三线建设与云贵地区工业发展刍议》,崔龙浩《三线建设中汽车工业的自主探索与困境——以第二汽车制造厂为例的考察》,瞿商、黄一栩《湖北省小三线企业的配套协作研究》等分别对三线建设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茶马之制是中央王朝对西北边疆民族贸易的一种方式。张锦鹏、冯全镇《从需求侧和供给侧看北宋“以茶治边”的经济逻辑》从需求侧和供给侧的角度出发,提出宋代“以茶治边”策略既是中原与边疆商贸往来日益兴盛的结果,也是中原王朝边疆治理的必然产物。李晓英《茶马之制停罢与清代甘肃茶商组织的变迁》从制度角度出发,解析了国家茶政变革是区域商人组织变迁的基础。

二、产业与企业发展

产业与企业的发展变化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紧密相连。王珏、白天鹏《清代景德镇瓷业产值的估算(1726—1911)》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宫瓷器档案以及部分实地调查的结果,估算了清代景德镇瓷业业的产值。焦建华《试析福建侨汇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1958)》论述了福建侨汇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桂强《殖民战争与金融:战时江南金融业演变实态(1937—1945)》通过对县志中江南 49 个县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全面抗战时期江南金融实态由“新旧并存”变为“银钱业为主”,反映了日伪政府只注重掠夺,不会真正地进行金融建设的殖民本质。张跃、杨振子《技术进步、市场需求驱动与产业发展——以中国近代蛋品工业为中心》结合中国近代蛋品工业,分析了市场需求对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王涛《近代中日棉纺织业中的制度变革与发展差异(1878—1894)》论述了在西方产品冲击传统棉纺织业的背景下,中日棉纺织业之间的发展差异。王成、陈杰《全面抗战时期工业合作运动发展模式探析》总结了抗战时期工业合作运动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了其历史地位与意义。卢征良《省营企业:值得关注的经济史研究新领域》认为学界在拓展省营企业研究内容的同时,还应加强省营企业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创新。林立强、高超群《政府干预与企业经营:企业史视域下的国营福建示范茶厂研究(1939—1942)》通过考察民国战时统制经济背景下政府干预行为对国营茶厂经营管理的影响,反思了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邱晓磊《1921 年苏纶纱厂经营权纷争案所见“租厂制”企业的内部治理》分析了“租厂制”企业的内部治理。李玉《从“合作博弈”到“非合作博弈”——1920 年代招商局政企关系的演变》从政企关系角度探究了招商局面对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查办”的两种不同结局。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的经济侵略和掠夺。王建云《一战前后大连日本商会在三线联络运赁政策上的抗争与妥协》指出一战前后大连三线联络运赁政策的推行,体现了日本部分势力在对华政策上的激进性、顽固性及军国主义特性。薛冰《17 至 18 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大班”制度研究》提出“大班”是 17 至 18 世纪中英贸易交流的现场见证者、成果创造者、直接参与者,他们推动了 19 世纪东印度公司乃至英国政府对华战略的制定。李沛霖《试析近代外商在华的交通经营——以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为例》指出全面抗战爆发前,法商电车电灯公司是近代上海首屈一

指的规模化企业。

清末民初,华资银行对中国传统金融产生了强烈冲击。贾欣潮、周亚《商学教育、职业流动与近代金融组织的人力资本变迁——基于票号、钱庄和华资银行的分析》认为在近代中国金融行业人力资本的变迁进程中,华资银行成为“承旧启新”的关键载体。王玉茹、裴丽婕《近代华资银行调查事务发展初探》认为华资银行信息调查事务的发展,提高了银行业调查资源的利用率,实现了信用调查的公共化。

1949年后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议题。陈碧舟《1959—1965年上海工业企业“比学赶帮”运动研究》对上海开展的“比学赶帮”进行了论述,认为这一运动推动了上海工业的进步。魏晓锴《新中国自主建设重型机械工业的探索:以太原重型机器厂为中心》指出太原重型机器厂凝聚着中国共产党自主发展重型机械工业的智慧与力量,为新中国重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姜迎春《福利“革命”: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劳动保险》探究了福利“革命”劳动保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发展变化。彤新春《李先念与湖北汽车工业的发展》强调李先念为湖北汽车工业的良性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其关于汽车工业的发展思想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挖掘的空间。刘琦易、易绵阳《从外引到内化:改革开放前株洲国营企业技术创新研究》以技术创新为中心,分析了改革开放前株洲国营企业技术从外引到内化的过程。

三、财政与社会治理

财政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与社会和政治问题紧密相关。陈勇《英德续借款偿付与清廷财政运筹》指出清廷在放手让各省就偿款责任进行内部协调的过程当中,以“省”为本位的所谓地方财政愈益显现。冷功业《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发展历程及未来展望》分析了我国债务规模发展演变的过程,总结了地方政府债务的特点,分析了政府债务存在的问题。郑京辉《制度何以落实:1956年工资改革贯彻机制与实践策略》结合1956年的工资改革,提出新制度的推行与构建,有赖于国家一套较为成熟的贯彻机制。

赋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国家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肖建新《论宋代库藏的审计法规》提出宋代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库藏审计法律,保障了赋税有效入库和财政的正常支出。吴娟婷《明清湘西南苗疆的里甲赋役与社会组织变迁》详细论述了明清湘西南苗疆的里甲赋役制度与社会组织的变迁过程。王浩禹《官民互动:宋代城市税收征收活动中的国家与市民之关系》指出宋代国家与市民的互动是国家城市治理及其能力的重要表现。盛海生、周晓光《貌合神离:清末新政与皖南茶叶征收》指出在清末新政中,经费来源缺乏催生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皖南茶叶税课的征收正是这一点的集中体现。王灿《税制变革、基层行政与近代徽州茶叶贸易》以近代徽州茶叶贸易为研究视角,论述了晚清税收制度与性质的改变。张莉《翻版、成本与权利:近代中国版税制度的实践困境》认为实施版税制度既是近代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内生需要,也是与世界制度接轨的重要标志。王武林《印花税与遗产税——近代概念与实践下的合与分》厘清了近代中国税制整顿过程中,印花税与遗产税在概念上经历的先混合后独立的发展历程。

盐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王嘉乐《两淮盐课余银报解与府部财源分配》对两淮盐课余银的产生及其支销规章的变动进行了详细细致的考察。吴志远、宋允《清代食盐“引岸”之争下的地方社会——以汝宁、光州为中心的考察》认为清代延续明代的食盐划分固定购销区的“引岸”制度,导致了清王朝地方治理与控制能力的削弱。韩燕仪《以饷定价:太平天国战争末期淮盐价格管制体系的重塑》探究了太平天国战争末期淮盐价格管制体系的重塑过程,最终形成了以军饷为核心的盐价管制体系。杨田华《地方精英与民国基层盐政近代化转型研究——以川北盐场治理为中心》探究了盐场地方精英群体的崛起及其权力来源,解析了这一群体与基层盐政近代化转

型之间的复杂关联。

瘟疫卫生和灾荒救济问题,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王汉东、田芙蓉《清初襄阳赈济陕豫流民的救荒实践》提出从清初陕豫救荒的实践上来看,襄阳地方官府强有力地执行了清中央政府的政令,展现出以俞森为代表的理学官僚较高的救荒能力。赵海峰、朱正业《何以活民命:1935年水灾工赈公债研究》探究了1935年国民政府发行水灾工赈公债的情况,指出财政支出增加、债信下滑,导致债券不敷分配,暴露了孔祥熙公债政策过度依赖金融统制,忽视债信建设的弊端。张侃、洪佳敏《试论东南鼠疫防治处的经费来源与运作形式(1946—1949)》根据福建省档案馆所藏的“东南鼠疫防治处”档案,考证了东南鼠疫防治处的经费来源,说明了民国晚期地方防疫经费的财政供应与卫生行政间的关系。

四、货币金融与市场

货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唐晔《市场宋代货币经济再评价》认为宋代货币经济的发达很大程度上是宋代财政收支货币化的后果,钱荒等问题是宋代货币制度跟不上现实需求的表现。卢伟《神权货币、王权货币与民权货币:货币债务说的一个分析框架》则考察了明代中叶的货币白银化现象。李裕威、燕红忠《九八规元与清代以来虚银两制度的演变》梳理清代以来虚银两的演变过程,提出上海九八规元的出现是虚银两演进的重要转折点,其在市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黑广菊、孙秀丽《清末民初天津造币总厂研究(1903—1921)》从金融发展史视角考察了天津造币总厂作为当时中国货币信用执行机构在近代中国货币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燕红忠、张跃《宁波过账制度与近代钱业市场的发展》考证了近代宁波过账制度,并指出其实质上创造了信用货币,增加了货币供给。孙睿《人本与信用:近代钱业与商业信用贷款研究》分析了近代钱业的信贷业务,认为银行与钱业差异与矛盾的背后,是“人”与“物”在金融业中的不同历史经验的体现。米嘉《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下地方官营银行及其信用货币的生存与博弈——以民国晋绥地区“四银行号”与晋钞纸币为中心》分析了南京政府正式开启法币改革后,地方货币与法币之间的博弈。王年咏、吴宛珂《中资银行引进外资入股的“股权贱卖论”与治理效应考辨》以1996—2021年引进外资入股的32家中资银行为例重新审视“股权贱卖论”,探究了中资银行引进外资的效果。何家伟、谢宏芝《山东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会计制度研究(1939—1948)》论证了山东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会计制度,充分肯定了其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

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北宋四川交子的出现则是货币史上的里程碑。邱永志、冯全镇《北宋四川纸币性质转变与发行管理模式新论——纪念官交子诞生一千年》通过对比私交子和官交子的差异,分析了早期纸币发行机制的转变以及优劣。此外,李金闯《北宋徽宗朝大规模推广纸币过程研究》,王文成、何姣《两宋金元时期纸币的性质与功能》,康金莉《民国前期华北县乡区域性纸币发行与流通研究(1912—1935)》也都对不同时期或不同区域纸币的推广、性质及流通做了相关分析。

市场作为商品交换的场所,有其特殊的功能。邹立波《歇家、锅庄与旅马店:互惠交换传统与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考察了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路径,揭示了青藏高原社会经济东向发展的内部动力和历史进程。方前移《长江流域棉纱布市场多国资本群体博弈(1840—1937)》探究了长江流域棉纱布市场多国资本群体博弈的历史,认为近代长江流域棉制品市场具有鲜明的混合特征,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中的殖民市场。张崇旺《近代淮河流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特点》认为近代淮域商路变迁和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近代转型。

五、商业、商人与经济思想

商人、商业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史研究的一大热点。马长伟《近代徽州商人投资银行业失败的历史考察——基于资本要素的分析》从资本要素的角度,认为在历史变局下制度激励缺乏、创新动力不足,是徽商向银行业转型之路中断的根本原因。廖涵《清代江西商业市镇的社会治理》提出传统商业市镇的基层自治通过国家授权与商人自治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满足了商人扩大贸易和获取社会权威的诉求,达到了官府希冀的社会治理实效。刘成虎、辛嘉英《旅大鸦片走私与销售数量:鸦片案背后的国家犯罪》论述了日本殖民当局在旅大殖民地长达1年半时间里的大量买卖和走私鸦片的案件。牛浩、袁为鹏《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企业商标权保护——对民国时期商标争议案件的计量分析》使用计量方法,分析了1925—1937年百余件企业商标争议判例,论述了中国近代企业商标权保护的实际情况。龚宁、张利民《近代天津与腹地的商品流通规模与范围初探——基于天津常关统计》认为开埠和近代化对于区域经济的冲击是源于传统经济联系和区域经济的现实,经过反复消化和调试的一种反馈,而不是单一的“冲击-反应”机制。

通过以地方典籍和碑刻为中心的商业史研究可以更好地凸显地区商业特色。许檀《清代前期山陕商人在亳州的经营活动——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运用碑刻资料考察了清代前期山陕商人在亳州的经营活动。李平亮《乡籍、行业、祀典与公共事务:清代商业会馆的层级化与地方化——以〈澧州津市万寿宫志〉为中心》对津市江西会馆进行历史考察,揭示了文化传统、公共事务与清代商业会馆层级化、地方化的内在联系。董乾坤、颜艳萍《以帐为凭:知识与技能与晚清民众日常生活的商业化——以胡廷卿家庭收支账簿为核心》认为家庭收支账簿在对商业账簿的接受与应用的同时,也突出着“家庭收支”的个性化色彩。晏雪莲、薛合祥《艰难图存:民初山西旅蒙商在张家口的经营实态——以〈兴隆魁信稿〉为中心》提出旅蒙晋商在民初蒙地乱局中艰难图存,并苦心经营,展现了传统商业机制的顽强韧性。

中国是一个从未中断过对外贸易的国家。方书生《近代中美贸易结构及其演化(1902—1948)》认为在近代中前期,中美两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各自的比较收益,并不断增强双方贸易依存度;在近代中后期,中国未能及时完成工业化,失去了贸易结构自我优化的机会。马伟《近代青岛对日本牛肉输出研究》及刁莉、龚英姿《1602—1794年间的中荷瓷器贸易》则分别对近代青岛对日的牛肉输出及百余年的中荷瓷器贸易进行了探讨。

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周建波、魏领昊、周子超《叹商与李大利的成长》认为李大利等倡导的革新精神和“劳工神圣”观念为叹商提高思想境界,完成从传统商人向现代商人的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刘长林《思想与现实之背离:20世纪30年代“学院派”对中国农村的思考——以吴景超与托尼为中心》提出在20世纪30年代“学院派”受资本主义社会学思潮的影响,无法认识到国民政府对西方国家的“依附”以及农村经济对城市经济的“依附”,导致其农村建设只能是的空想。沈博《近代南洋华人社会“商战”观念的内涵演绎及其逻辑进路》认为“商战”观念内涵的演化进路蕴含着重商主义、民族主义和进化主义等多重逻辑,其双重本位意识则透露着南洋华人民族情感和生存策略互促共存的一面,是南洋华人社会近代化转型在意识世界中的一次集中映射。

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分析,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缪德刚《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发轫——张培刚农业发展思想考察(1934—1945年)》考察了张培刚农业发展思想,并指出张的学术形成路径对今天中国经济学体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张呈忠《“宋元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的学术史意义——王志瑞〈宋元经济史〉探论》认为王著在宋元经济研究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开拓价值。

六、其他

租佃契约与地权问题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李楠、刘晓敏、黄天宇《传统社会边疆地区的地权交

易与土地经营:以清代土默特地区为例》以 18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蒙古土默特地区金氏家族的契约文书为案例,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地经营方式以及受其影响的土地要素资源配置、社会总体福利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刘紫卓、龙登高《清代租佃契约中的保人与地权交易》基于博弈论模型,探讨了清代租佃契约中保人机制与地权市场的互动关系,为地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铁路发展与近代社会经济生活有着密切联系。赵劲松、何佩霖、蔡杨《晚清铁路建设与辛亥革命》通过定量分析 1902—1911 年县级铁路和社会冲突,探讨了铁路建设在晚清革命中的作用,指出铁路显著提高了经过地区人民响应辛亥革命的概率。赵伟《由乱趋治:近代中国铁路货等制度治理》考察了近代中国铁路货等制度由乱趋治的过程。

民国时期金陵大学农经系主任卜凯主持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陈德仙、胡浩、虞祎《民国卜凯农户调查数据的整理与利用》介绍了卜凯调查原始资料的抢救性整理过程,认为卜凯数据的再利用将为经典农经理论的修正提供新的证据,也能够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历史经验。洪道远、彭凯翔《卜凯调查中生产数据及利用的重新评估》澄清了以往对卜凯调查过程的认识,对其调查地区及样本的选择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对卜凯调查中的农业数据进行了甄别。

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建设与发展问题的讨论。宋玉军《新中国建立初期促进就业的政策举措与反思》认为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政府在把握国情的基础上确定了就业工作的重点,正确地制定了适宜的政策、措施。常明明《外流与回流:新中国工业化初期农村劳动力的流动(1953—1957)》梳理了新中国工业化初期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情况。邓宏图、赵燕、徐宝亮《20 世纪 50—70 年代教育改革的“长波效应”:人口红利、工业化和长期经济增长》探讨了 1949 年以来劳动力要素对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增长做出的重要贡献,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红利”进行了经济史视角的逻辑解构。

结语

在闭幕式主旨报告中,中国经济史学会顾问、山东大学特聘教授陈争平指出,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民间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构建良好的市场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长久繁荣。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对“交子”产生的社会机制问题进行了评论。安徽大学历史学院院长盛险峰,分析了五代财政集权的路径、模式及其制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苏少之提出,在今天人们可能再不会用限制、打击农村中最具生产率和经济活力的农民积极性的办法来消除农村中的贫富差距,这既是新时代的新思维,也是历史给予人们的启示。安徽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徐亚平指出,地区经济发展,短期靠项目、中期靠政策、长期靠环境。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主题会议之外,与会专家学者还开展了《让经济史学术更美:关于经济史论文与著作写作的研讨》的互动研讨会,进一步促进了学者间在写作上的交流。本次会议的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问题意识,分组讨论议题多元,各位专家学者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论述充分翔实,研究的时段长、区域广,研究的内容丰富、方法多样,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史研究近年来的成果,是一场高质量的学术盛宴,必将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创新、进步与发展。

(责任编辑:马 烈)